

也谈冷战的起源

北大国际研究所
张小明

冷战起源是战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没有任何论题能象冷战起源这样，引出如此之多的论著问世，激起如此尖锐而激烈的争论。”^①从四十年代末至今，在美国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研究中，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学派。^②中国学术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不多，很长时间以来沿袭苏联的观点，即认为冷战是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反苏、反共的政策或活动；^③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著作倾向干认为战后美国企图凭借强大的实力称霸世界，从而导致冷战的产生；^④近年来，有学者撰文，对战后苏联政策有一定的批评，认为冷战是美苏两国利益冲突或“利害冲突”的结果。^⑤

笔者认为，中外关于冷战起源的著述大多或注重于冷战产生历史过程的描述，或偏重某一因素和单一国家的分析，有很多不足之处。本文想作一个尝试，从国际体系、国家以及个人三个层次进行综合分析，^⑥既描述历史事实，也进行理论归纳，既分析美国，又分析苏联。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其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彻底摧毁了旧的国际体系，使战后政治家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国际体系。

首先，这场战争对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产生了“深刻的、持久的和确定不移的影响”。^⑦昔日的强国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击溃。英法受到严重削弱，战后实际上已降“二等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战后成为世界最强国。新的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显著特征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在1945年，新的权力天平上只剩下美苏两国。”^⑧由于战争的进程，两大国的力量在欧洲、中东与远东等地区交汇。苏联红军占领了东欧诸国及德国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苏军的西面便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军队的驻扎地。在中东，苏军占领伊朗的北部，英美联军占领其南部。在远东，美国占领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太平洋诸岛屿，苏军则占领其西面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等地。

其次，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战败，世界出现了大片“权力真空”地区，它们主要是曾在法西斯国家铁蹄之下的北欧、东欧、中欧和西欧陆地国家，太平洋岛国和其他岛屿，东南亚国家，以及法西斯国家的属地与委任统治地，等等。如何“填补”这些“权力真空”地带，这是战胜国，主要是美苏两国，在战争后期就已开始面临着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⑨

最后，战争带来了战后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和经济混乱。西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在战争中领导人民坚持地下抗战，深受群众的尊敬，战后其影响发展很快，存在取得政权的可能，这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敌视，前者受苏联支持，而后者则为英美扶植。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是战争中反抗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解放了大部分国土，而英国得到美国的支持，极力使希腊流亡政府重返德国掌权，排挤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在苏军的配合下解放了全国，而英国却努力让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回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地区国家，亦有类似冲突，进步与反动力量的斗争十分尖锐。同时，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经济混乱状态，孕育着紧张的社会矛盾。

国际体系的上述变化，为美苏间的冲突与对抗，由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因为两大力量相交汇即潜伏着冲突的因素，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和睦相处是困难的；广大的“真空”地带为大国间的斗争提供了场所；动荡的政局和混乱的经济状况，会将两国拖入广泛的国际纠纷中去。

(二)

一国的对外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体系的制约，但是国际体系并不是影响一国对外行为的唯一因素。单从国际体系的变化，尚不足以解释美苏为什么会从同盟走向冷战。国际体系的变化只为两大国的冲突提供了条件，使冷战成为可能。两国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解决战后面临的问题。然而，战后的事实是，美苏两家并未选择合作的方式，而是逐步走向冷战。这是因为美苏两国意识形态信仰对立、国家利益构想相悖，或者说两国行为动机是相抵触的。

苏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为资本主义最强国，信仰着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受意识形态信仰的推动，两国根据战争的进展和战后局势，努力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影响范围，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制度。二战中，罗斯福执行现实主义外交，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结成了同盟，两国战时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但罗斯福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其对外政策中不能不没有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更不可能是“白宫的赤色分子”^⑩。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对东欧政策上。表面上，罗斯福主张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然而实际上，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化”，从而也就削弱苏联本身的力量。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冷战史教授所说的：“美国（在东欧）的目标是确保东欧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和至少在理论上保留一个共产党政权的权利。然而，事实上美国官员从来没想到过有这么一种可能，即自由选择会使共产党继续掌权，从而使苏联的行为合法化。……如果真的举行自由选举的话，现在的苏联扶持的政权必将被击败。因此，倾向支持自由选举的政策，便是对苏联在东欧行为的直接挑战。”^⑪雅尔塔会晤中发表的《被解放了的欧洲宣言》便渗透了罗斯福的此种想法，为战后美苏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埋下了根子。罗斯福的亲密助手霍普金斯就说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要）努力利用我们的外交力量，推进和鼓励民主政权在全世界建立。我们不应当害怕向世界表明我们的立场，即要求世界人民都有建立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的权利。我们坚信，我们具有生命力的民主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⑫欧洲战争即将结束时接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战前就是一个著名的反共敌客。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星期，当时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就公开发表言论，主张让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希特勒法西斯相互残杀^⑬。杜鲁门就任总统后，反苏反共和推进美国制度的思想溢于言表，他认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⑭并在其实际政策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美国在战争后期努力抢占地盘，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和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国家一道，扑灭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以不同方式支持当地保守势力。麦克阿瑟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建立与美国类似的制度。在中国，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南朝鲜，美国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李承晚运往这里组织政府。在东南亚，美国支持英、法、荷对当地进步力量的镇压。在西欧，美努力以经济援助稳定局势，并支持西欧政权排挤共产党人。在东欧，杜鲁门政府继承了前任

的政策，坚持“民族自决”和“自由选举”，指责苏联不履行雅尔塔协议和《被解放了的欧洲宣言》，并以各种方式支持当地反共势力。等等。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在其对外政策中亦有意识形态的考虑。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思想解放，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复杂的国际现象。但是，在批评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时，我们不应走向极端，从而否定其对政策中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考虑。斯大林曾经说过：“这次战争不比以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制度。”^⑤1948年5月4日，斯大林在给铁托的一封信中说：“苏联红军帮助了南斯拉夫人民，粉碎了德国侵略者，解放了保加利亚，以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取得政权创造了条件。很遗憾，苏军没有也不能给法、意共产党以同样的帮助。”^⑥战争后期及战后，苏联红军帮助东欧诸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客观事实。北朝鲜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苏联红军。斯大林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他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但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苏联亦逐步给中共一些援助^⑦。

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美苏两国战争后期及战后行为的主要动机。美苏国际行为最基本动机是国家利益构想，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莫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思想是政治的核心。”^⑧此种说法虽有绝对化和过分夸大国家利益的作用的倾向，但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

国家利益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无统一、明确的定义。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虽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有下面一些最主要的内容：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威望与对外扩展势力，等等^⑨。国家利益的内容与范围，很大程度上与一国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对本国国家利益的估价有关，带有主观成份。因此本文使用“利益构想”这一概念。苏联的利益构想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根据苏联战时和战后的行为，我们可以认为，确保安全，特别是西部边境的安全，是其国家利益构想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苏联西部是开阔的平原地带，缺乏自然屏障如“大洋、崎岖山脉、连绵的沼泽以及不可逾越的森林”等等^⑩；俄国历史上多次受到来自西部的入侵，如17世纪波兰人入侵，火烧了莫斯科城，以及1812年战争中拿破仑军队攻击俄国。苏维埃俄国诞生后就遭受的两次德国进攻，最后一次是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使苏联丧生二千万人，经济损失惨重^⑪；战后苏联百废待兴，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这首先要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西部边境。因此，战争后期及战后苏联国际行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I. 确立可靠的边界。早在德国进攻苏联前，苏联出兵占领居民多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波兰东部领土；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小国并入苏联；通过苏芬战争将两国边界向西北推进了好几英里。战争后期，随着红军的向西推进，苏联除了收复上述战争中的失地外，还将西部边界继续向西推进，如兼并喀尔巴阡山的露西尼亚，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那，等等。战后，苏联与有关国家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苏联西部边界。II. 帮助建立和支持对苏友好的政府。1944年起，苏联红军进入东欧，解放或协助当地游击队解放了波兰、捷克、德国东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政权，苏联这种举动既有国际主义的动机，又有保证在两部有一系列有好国家以确保自身安全的考虑。III 确保德国不再单独发动侵略。历史上德国两次入侵苏联，给她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此从国

家安全考虑，严惩德国以保证其今后不再发动侵略，成为苏联一项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在处理德国问题上，苏联主张盟国分区占领、索取高额赔偿、严惩纳粹战犯、非军国主义化、非卡特尔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等等，并在自己的占领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是，应当指出，苏联在追求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表露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首先，苏联将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进。割占大片领土，这是强迫当地国家接受的。与此类似的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达成秘密协定，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而且苏军占领中国东北后运走了大量工业设备。其次，在东欧，苏联没收了德国的财产，包括罗马尼亚石油生产设备，控制了许多国家的生产，并将大量的生产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到苏联，严重影响了东欧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与东欧党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表现在粗暴干涉它国内政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以后苏南分裂的根本原因。最后，苏联亦有尽力向雅尔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扩展势力，追求俄国传统的南下和夺取出海口政策的倾向，如斯大林向土耳其提出领土和控制黑海海峡的要求；苏军未按协定如期撤出伊朗；苏联想托管意大利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亚；等等。

战后苏联国家利益构想主要是维护本国的安全，尤其是西部边境的安全，带有地区性。而美国战后的利益构想则具有全球性，要“领导”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得到急剧膨胀，战后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企图“领导”世界，这就是战后美国国家利益构想的最主要的内容。美国这一国家利益构想早在战时就已形成。1944年10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外交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中就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②杜鲁门总统多次发出“领导”世界的论调。在他就职后不久，杜鲁门就无意中告诉一位早期的来访者说：“俄国人不久会被放到他们应坐的座位上去的；然后美国将领导世界，按照确定的方式去管理世界。……”^③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演讲中，声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④。由于自持实力强大，企图“领导”世界，美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利益是遍于全球的。关于这一点，1945年5月26日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晤中清楚地谈到：“为美国人民所充分支持的罗斯福总统政策的主要基础，一向是如下的概念：美国的利益是世界范围的，不限于南北美和太平洋，而且正是这一概念导致了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的涉及世界和平的许多会议。”^⑤为实现这一国家利益构想，战争后期及战后美国的政策是：I“填补真空”，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前面提到，主要由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战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真空”地区，美国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对德战争中，美英为了减少伤亡，极力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当1943年起，苏联红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于次年初向东欧挺进时，美英急忙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抢占地盘，避免整个欧洲大陆落入苏联红军的手中。^⑥为了约束苏联的行动，1944年10月，丘吉尔匆忙飞赴莫斯科，和斯大林达成了瓜分巴尔干的“百分比协定”，丘吉尔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低上的协议限制斯大林的行动。”^⑦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行为虽未表态支持，但也没有提出异议^⑧。在意大利，1943年7月意大利投降后，美英拒绝苏联关于成立三强委员会的要求，只让后者参加纯属咨询性的机构。在远东，美军占领了日本及其太平洋属地，斯大林曾提出日本象德国

一样分区占领^②，美国拒绝，只成立毫无实权的远东咨询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向日军开仗，并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杜鲁门急忙向麦克阿瑟下达了总命令第一号，并转告苏联，划分了远东受降区，包括以北纬38度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分两个受降区，以阻止苏军占领整个朝鲜，苏联接受了这一安排^③；在中国，美通过与苏的幕后交易，使后者支持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还以抵制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将势力渗入诸如伊朗、土耳其、希腊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在拉美，德、意、日在此的势力因战败被赶出，英、法、荷等国在该地区的力量（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因本身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而大大下降。美国通过经济援助以及战时和战后几个军事性条约，牢牢控制了该地区，使之成为支持它在全世界扩张的稳固后院。这样，美国的力量以惊人的规模扩张起来，“由于美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媾和的条件，美国控制新的势力范围远离它的国境达七千里，包括最强的亚洲国家日本以及潜在力量最强的欧洲国家德国。1942年以来，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海洋的统治者，包括‘过去英国最不容旁人染指的海域’东地中海。1946年，美国军队仍驻扎在五十六个国家，遍布各洲。”^④其结果，“苏联所拥有的权势大体上局限在于东欧这个地区，而美国则已成为全球性的强国。”^⑤Ⅱ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1年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提出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初步草拟了组织章程，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罗斯福筹建联合国的基本思想，是“大国合作”控制世界，而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⑥。同时，美国积极制定战后国际经济的方案，促进国际经济自由化，以适应美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其结果是1945年底，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均按资金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上为美国控制，成立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⑦。Ⅲ削弱苏联，使之“瓦解或逐步软化”^⑧。美国要“领导”世界，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苏联。苏联在二战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战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其周围有一批新兴的民主政权国家。为了达到“领导”世界的目的，美国努力缩小苏联的“势力范围”，削弱苏联的力量，使之“逐步瓦解或软化。”这突出表现在对东欧的政策上。美国坚持东欧国家“民族自决”和“自由选举”，以将苏联势力挤出这一地区。因此，在战时，美苏在东欧问题上就有过激烈的争吵，以至于1945年4月初，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承认“目前的局势处于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的气氛之中。”^⑨杜鲁门接任总统后，继承了前任的东欧政策，而且态度更为强硬，多次指责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和《被解放了的欧洲宣言》。杜鲁门政府中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商业部长亨利·华雷斯等人主张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但这种观点在政府中不占上风，他们先后辞职^⑩。1945年12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同苏联达成一些妥协，苏联支持美国的国际原子能计划，美国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杜鲁门获悉后，极为恼火，指责贝尔纳斯“姑息”苏联，并在次年1月5日当着他的面指责他对苏不够“强硬”^⑪，不久贝尔纳斯便去职。

因此，苏美国家利益构想是相悖的，双方为实现自己国家利益构想而采取的政策是相抵触的。概括起来说就是，苏联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势力范围”，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而美国为了“领导”世界，则努力削弱苏联，包括缩小乃至最后消除苏联在东欧的影响。

(三)

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使美苏两国的冲突和对抗成为可能，而奉行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

和国家利益构想相悖，使美苏在世界范围内迎头相撞，冲突与对抗不可避免。但是，要较为完满地说明和解释冷战的起源，只进行上述两个层次的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即对两国领导人行为的分析。笔者认为，两国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与处理外交的方式，扩大和加深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促使冷战最后得以产生。

美国一位学者在研究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决策时，说过这样的话：“认识（Perceptions）总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一部分是现实，一部分则是认识者（Perceptioners）的思想形式。”^④这是符合战后美苏关系现实的。两国领导人于对方行为动机的认识，既有符合事实之处，也有主观扩大的地方。本文在分析两国意识形态信仰与国家利益时提到，由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苏联努力将自己的制度推进到势力所及的地区和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但是意识形态信仰，并不是苏联行为的主要动机。苏联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国家利益构想，首先是确保西部有一个稳定的边境，确保国家安全，为战后恢复和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战后美国统治集团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估价苏联国际行为动机的，他们或者扩大苏联意识形态的动机，认为苏联要在世界扩展共产主义的影响，要“搞乱”西方世界“内部的和谐”和“破坏”其“传统的生活方式”^⑤；或者过分夸大苏联历史传统对当今苏联的影响，认为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如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他在杜鲁门政府中属于温和派，主张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但他也认为东欧是苏联“西进的跳板”。杜鲁门主要对外政策顾问为驻苏大使哈里曼、海军部长福莱斯特、海军上将李海和副国务卿格鲁，等等，他们都认为苏联有扩张主义的倾向，“他们甚至在二战期间就‘疑虑重重’，不相信有可能同苏联建立一种关系，1944—1945年的事态发展更使他们满腹疑虑，放心不下。”^⑥对苏联的看法带有偏见和歪曲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乔治·凯南了。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通”，长期在美国驻苏使馆供职，很早就形成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敌视。1946年2月22日，当时为驻苏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了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分析苏联的行为动机。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革命后维持国内“独裁”的需要，苏联极端敌视外部世界，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而对武力的逻辑则十分敏感”，“共产主义就象恶性寄生虫一生，只靠生了病的肌肉组织来养活自己。”^⑦凯南对苏联行为动机的分析，迎合了美国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对苏联的行为估价，因此他青云直上，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⑧杜鲁门总统被认为是外交上的“一个新手”，在任罗斯福的副手中只见到过总统本人三次，他自己在1948年也承认罗斯福从不和他谈战事、外交以及战后世界安排，因此他战后严重依赖顾问的指导^⑨。上述官员的观点显然影响了总统，而且与杜鲁门本人一贯反苏反共思想有吻合之处。由于对苏联的行为动机带有上述偏见，苏联战后对东欧政策，苏联在伊朗、土耳其等地的行为，以及苏联要求托管前意大利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亚，等等，都被认为是苏联“扩张主义”的表现。希腊内战，美国认为希共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事实上苏联在希腊问题上遵循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的。南斯拉夫和英美在的里雅斯特地区发生冲突，杜鲁门及其顾问亦认为南斯拉夫游击队背后有苏联的支持，表明共产主义要尽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事实上，苏联是要求铁托在这个问题上同西方妥协的^⑩。应该指出，美国领导人于苏联行动动机的偏见，既有认识的问题，又有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构想而故意歪曲对方的形象，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的考虑。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认识，同样也有主观夸大、偏离事实的地方。苏联领导人很少写回忆录，外交档案未公布，因此要将他们对美国行为认识清楚地勾画出，是十分困难的。笔者只想从几件事例说明，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行为的估价

确实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例如欧洲第二战场问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多次要求美苏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英美多次拖延。英美的此种行为故然有损人利己的动机，但亦有客观原因。苏联领导人显然夸大了前一种倾向，认为英美遵循的是“杜鲁门参议员道出其实质的那种战略”^④，以至于1944年6月5日，即“霸王”行动的前一天，斯大林还认为，英美可能还会找借口拖延，仍象往常一样给予许愿^⑤。这件事虽是发生在战时，但它说明，苏联对美国行为的猜疑和不信任的思想是存在的，影响了它战后与美国的关系。又如1945年5月27日晚，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谈起了美国政府的几个行为，“在苏联政府圈子里引起一种反感”，他说，这些人士对于美国政府态度“感到惊吓。他们的印象是，德国的战败一经变得明显时，就觉察出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冷淡’下来，这好象说是不再需要我们了。”斯大林所说的美国几个行为是：阿根廷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苏联认为这是违背雅尔塔关于只有1946年3月11日以前对德宣战国才可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协议；雅尔塔商定，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参加赔偿委员会，后来美国坚持让法国参加，斯大林认为，“试图把法国放在与苏联同等的地位，象是企图要使苏联丢脸”；波兰问题，美苏对雅尔塔协议解释不一，苏联认为美国的波兰政策是要建立对苏不友好的政府；租借法案物质被削减的方式，斯大林认为美国打算以此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软化”等等^⑥。斯大林说的基本属实，但也有误解的地方，并且夸大美国的敌意，经与霍普金斯交谈，一些误解得以消除。苏联领导人的认识主要产生于俄国和苏联历史、战后百废待兴和面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以及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咄咄逼人之势等等因素，而不是一些美国学者所称的斯大林的“偏执狂”^⑦。

另外，领导人的处理外交的方式也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新总统处理外交的方式不同于前任，尽管两人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罗斯福善于搞个人外交，他曾对丘吉尔说：“我想我个人同斯大林打交道，要比你的外交部与我的国务院要有效得多。”^⑧在任职间，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罗斯福与苏联领导人会晤频繁、来函不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消除两国许多误会和猜疑，促进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而杜鲁门就职后不久，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中就发生争吵。1945年4月23日，莫洛托夫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途经华盛顿，会晤杜鲁门总统。新上任的总统对来访的客人粗暴地指责苏联违反雅尔塔协议，以至于莫洛托夫愤然说到。“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话。”而杜鲁门则答道，“履行你们的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⑨1945年7月—8月，杜鲁门作为美国新总统参加战时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波茨坦会议），会议以后他表露出与斯大林的关系极不协调，他说：“斯大林是狗娘养的，我想他也是这样看待我的。”^⑩波茨坦会议后，杜鲁门再也没有见过斯大林。两人的通信只是在对日作战胜利前有一些。这样，杜鲁门上任以后，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变得冷淡，两国间重要的联系渠道逐渐缩小。同时罗斯福在追求美国利益构想时，采取的方式也较灵活，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以某些妥协求得对方的让步，解决不了问题便暂时搁置。而杜鲁门则显得僵硬，谈判中不允许作出妥协，如前面提到的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东欧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便受到杜鲁门的指责。而且杜鲁门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构想，迫使苏联让步，采取的措施也是粗暴的和明目张胆的。如战争尚未结束，杜鲁门就倾向对苏“强硬”，就任没几天就对来访的哈里曼说：“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⑪；德国刚投降，杜鲁门未事先告知便停止向苏运输租借物资，以至于开往途中的船只返回，装船的物资重新卸下；为了使苏联让步，美国故意拖延向苏贷款的谈判；等等。杜鲁门和罗斯福处理外交方

式的不同,给苏联人的印象是杜鲁门改变了罗斯福的政策,正如1945年底莫洛托夫所说的:“杜鲁门不同于罗斯福,对苏联采取不友好的态度。”^①同时,苏联在战后初期处理外交的方式亦有僵硬之处,如在东欧特别是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苏联态度是不够灵活的,但主要是对于美国咄咄逼人之势的被动反应。

总之,美苏两国领导人于对方行为的认识和处理外交的方式,加剧了两国的冲突和对抗,促成了冷战的爆发。但是个人的因素并不决定冷战是否产生,它只是加快了其产生的过程。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体系的根本变化,为美苏冲突与对抗从而由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而美苏意识形态信仰对立和国家利益构想相悖,使得两家迎头相撞,冲突与对抗不可避免;最后,两国决策者于对方行为动机的认识和处理外交的方式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正是由于上面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战后美苏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到1946年底或1947年初,双方都得出结论,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莫大的威胁。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企图使苏联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屈从自己,从而挑起了冷战。1947年3月12日,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演讲,公开提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进行抵制,并向希腊与土耳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接着又提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随之采取反击措施,和东欧国家签友好互助条约、成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和经互会等等。以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出笼为标志,美苏走向公开的、全面的对抗。由于历史的遭遇,世界人民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反对战争,由于战后美国虽拥有军事上一些方面的优势,但是美苏两国总的军事力量对比(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基本上是均衡的,等等因素的制约,美苏对抗未采取“热战”的形式,而是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如进行外交战、宣传战、武力威胁和通过第三国进行战争等等,但不诉诸直接的战争。

冷战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中外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说明和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同时,作者亦想通过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分析冷战的起源,来探索一条分析国际关系的途径。一个国家的行为及其与其它国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归纳起来不外是国际体系、国家(包括国内制度、意识形态信仰、国家利益与公众舆论等等)和个人(如性格、经历以及认识水平等等)三方面的因素。三方面因素作用的大小并不是一样的,因具体情况而异,如危机时期个人因素影响较大,而平常时期则相对要小,而且三者常常是相互作用的。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学者对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于中国学者有借鉴意义。本文是一个初步尝试,一定有许多不足之处。

注 释:

① 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第34页。

② 三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及代表著作,参见①以及《170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指南》第701-702页(Richard Dean Burns ed: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 P. 701—702,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83.)

③ 《辞海》(国际分册)第185页,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苏)《外交史》中译本第五卷上册有关章节。

④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国际关系史》下册,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⑤ 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二期,第30—31页;潘光、邓新裕:《战后初期苏美英三大国在中东北部的抗争——兼论“冷战”的开端问题》,《西亚非洲》1986年第6期。

⑥ 本文对冷战起源的分析受美国一些国际政治理论著作的启发,主要有:肯尼思·N·华尔茨的《人,国家与战

争》(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New York); 詹姆斯·E·多格蒂等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Harper Row, Publishers, Inc. 1981) 以及K J霍尔斯特蒂的《国际政治——分析的框架》(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hird Edition, 1977, New Jersey)。

- ⑦ [美] A·W·德坡特:《欧洲与超级大国》,中译本,第1页,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⑧ 同上书第78页。
- ⑨ 乔治·F·凯南:《冷战以后——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1972年10月号《外交季刊》(George F. Kennan: "After the Cold 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Foreign Affairs*, Oct-1972)。
- ⑩ [美]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上册,第1—2页,1984年商务印书馆。
- ⑪ 戴维斯:《冷战的开始》第386—387页,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Lynn Etheridge Davis: *The Cold War Begins*, P. 386—38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⑫ 亨利·H·亚当斯:《哈里·霍普金斯传记》,第398页,1977年,纽约(Henry H. Adams, *Harry Hopkins: A Biography*, N. Y. 1977, P. 398)。
- ⑬ 1941年6月27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41, P. 7.), 参见[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中译本第13页,1980年商务印书馆。
- ⑭ 《国际关系史》下册,第42页,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 ⑮ 德热拉斯:《和斯大林对话录》,第114页,1961年纽约版(M.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P 114, 1961, N. Y.), 转引自《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第19页。
- 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苏南争端》,1948年伦敦(The Soviet-Yugoslav Disput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8.), 转引自托马斯·T·汉蒙德:《冷战起源的见证人》,第13页,1982年西雅图(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 13, 1982, Seattle, ed. by Thomas T. Hammond)。
- ⑰ 曲星:《苏联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对华政策》,《国际共运》,1986年第六期,第1—9页。
- ⑱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第六版,第10页(Hans J. Morgenthau &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th Edition, P. 10, 1985, N. Y.)。
- ⑲ 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第18—46页,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 ⑳ 小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1967年10月号《外交季刊》(Arthur Schlesinger,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Oct. 1967.)。
- ㉑ [苏]波洛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译本)下册,第623页,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㉒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第67—68页,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 ㉓ H.H.阿诺德:《全球使命》,1949年纽约哈泼公司(H. H. Arnold: *Global Mission*, N. Y., Harper, p. 49), 转引自[美]戴维·霍罗维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中译本,第275页,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㉔ 《基辛氏当代文献(1946—1948)》第7826页(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6—1948, P. 7826)。
- ㉕ 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下册,第554页,1980年商务印书馆。
- ㉖ 约翰·刘易斯·加第斯:《美国与冷战起源》,第72页,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John Lewis Gaddis: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 7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㉗ 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90%,在保加利亚占75%;英国在古希腊的势力占90%;英苏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势力各占50%。参见柯林·波恩和彼得·J·莫尼:《冷战到缓和和1945—1980》第二版,第17页,1981年伦敦(Colin Bown and Peter J. Mooney: *Cold War to Detente, 1945—1980*, Second Edition, P. 17,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1, London)。
- ㉘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下册第487—490页。
- ㉙ 同上书第572页。
- ㉚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上卷,第380—386页,1974年三联书店。
- ㉛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文),第63—64页。
- ㉜ 托马斯·G·帕特森:《美苏对抗》,第8页,197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Thomas G. Paterson: *So-*

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3, P.8)。

- ③ 《国际关系史》下册，第18—40页。
- ④ 同上书第40—42页。
- ⑤ 乔治·F·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年7月号《外交季刊》(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 ⑥ 《1941—1945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第206页，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 ⑦ 史汀生的观点见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1967年10月号《外交季刊》；华雷斯的主张见他在1946.9发表的著名演说，该演说录于托马斯·帕特森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主要问题》第二卷第284—289页(Henry Wallace, "Toward World Peace", in Thomas G. Paterson ed.: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II, P. 284—289)。
- ⑧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一卷，第510—520页，1974年三联书店。
- ⑨ 约瑟夫·奈伊：《美国对苏政策的决策》，第226页，1984年耶鲁大学出版社(Ernest R. May: "The Cold War",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ed. by Joseph S. Nye, J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26)。
- ⑩ 《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五一一号(节录)，1946年2月22日》，《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 ⑪ 《超级大国与欧洲》，第115页。
- ⑫ 同上书第126—127页。
- ⑬ 同上。
- ⑭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356页，1967年波士顿(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9, P. 356, 1967, Boston)。
- ⑮ 托马斯·G·帕特森：《在各条战线上一冷战的形成》第147页，1979年纽约(Thomas G.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P. 147, Company, N.Y.)。
- ⑯ 罗伯特·拉贝尔：《遏制的序幕——杜鲁门政府对1945年5月的里雅斯特危机的反应》，《外交史》杂志1986年春季号，第141—160页(Roberto Rabel: "Prologue to Containment: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Trieste Crisis of May, of 1945",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86, P. 141—160)。
- ⑰ [苏]萨伊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苏关系》，《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二期，第38页。
- ⑱ 《从冷战到缓和1945—1980》第二版，第5页，1981年伦敦。
- ⑲ 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谈话见《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第559—589页。
- ⑳ 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1967年10月号《外交季刊》。
- ㉑ 里曼等：《特使》，第440页，1975年纽约(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 440, N.Y. 1975)。
- ㉒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一卷第71—74页和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中译本)，第264—266页，1975年商务印书馆。
- ㉓ 约翰·L·加第斯：《美年与冷战的起源》，第243页，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㉔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一卷，第61页，1974年三联。
- ㉕ 帕特森：《在各条战线上》，第56页，1979年纽约。